

行走中西：构筑跨文化之桥

——约翰·布莱尔和杰鲁莎·麦科马克教授访谈

刘燕

访谈对象：Prof. John Blair (约翰·布莱尔)

Prof. Jerusha McCormack (杰鲁莎·麦科马克)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外聘教授，以下简称 B. & M.)

访谈人：刘燕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学院教授，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UCD 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刘)

访谈地点：爱尔兰都柏林，B. & M.家中

访谈时间：2012年1-2月

背景介绍：John Blair (1934-)：美国国籍，大半生在西欧度过。美国 Brown University 本科与博士（英美文学与文化专业），Columbia University 硕士。曾在美国 Oaklan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irginia、法国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等多所大学任教。1970年至2000年期间，他担任瑞士 University of Geneva 的美国文学与美国文明教授，著有《美国模式：对美国兴盛之道的跨文化透视》 (*Modular America : Cross-Culture perspective on the Emergence of An America Ways*, 1988)等书。自1988

年来到中国，他长期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客座教授，致力于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与教学。

Jerusha McCormack (1943-)：美国与爱尔兰双重国籍，大半生在西欧度过。美国 Wellesley College 本科，Brandeis University 硕士与博士毕业。自 1971 年她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UCD）英语学院任教近 30 年，并主管美国设 Boston University 设在都柏林的“爱尔兰研究”项目。其研究领域为 1840-1920 年间英美、英爱文学，涉及王尔德、艾米丽·迪金森、亨利·詹姆斯、美国颓废文学等，著有《爱尔兰人王尔德》（*Wilde the Irishman*，1998）、《称为道林·格雷的人》（*The Man Who Was Dorian Gray*，2000）等书，其主编的《爱尔兰人与中国》（*The Irish and China*），中文版由王展鹏、吴文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年出版。2004 年她提前退休，被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客座教授，并帮助北外成立中国第一个跨学科的“爱尔兰研究中心”。

John Blair 与 **Jerusha McCormack** 两人一起合作主编了教材《西中文明比照》（*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omparisons*，简称 *WCwC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初版，2010 年第三版。

刘：非常荣幸在爱尔兰都柏林见到你俩，在你们舒适温馨的家中做采访。我知道来中国工作之前，你们曾在美国、爱尔兰以及欧洲大陆的一些大学求学与任教，长期从事美国、英国、爱尔兰、及欧洲大陆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与教学。那么，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对中国文明产生了兴趣，从对西方文学与西方文明的单向研究转向了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

B：我是 1988 年到北外任教。此前我长期在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美国与欧洲的文学与文化比较课程。来中国之后，我遭遇了一次“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因为我发现我所做的研究根本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因为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属于同一个西方文明的体系，其差异只是细枝末节。而中国文明是与西方文明属于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体系，它为我们俩人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和观察点。于是，我成为了一个学生，在北外旁听了丁望道先生用英语讲授的“中国经典文本选读”，这门课程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明的大门，我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传统的新领域。

刘：我记得 2007 年你们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学院的研究生们做了一个有关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讲座，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你们主编的《西中文明比照》（WCwCC）成为他们最欣赏最受益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时隔不久，你们又推出第三版的修订本。你们最初怎么想到要编写这么一本教材？

B：我在北外任教的时候，为英语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开设了“西方文明”的课程，当时使用的是一本美国教材，我注意到这本教材的教授对象的是英美大学生，并不适合中国大学生，于是把这一问题向主管反应。中国的同事反问道：“为什么你自己不编写一本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呢？”他们希望我们开设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明比较的课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撰写此类教材。

自 2003 年以来，我为英语学院（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研究生们开设了必修课“中西文明比较”课程，学生们来自语言、文学、文化、外交、地区研究（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等不同的专业，多达 200 余人。后来，Jerusha 教授也来北外任教，她协助我一起完成了《西中文明比照》的最终稿。我们在北外的教学实践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跨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们意识到对外国文化的最好理解途径是把它与本国的文化进行一对一的比较。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会选取一些在中西文化中的重要文本、核心观念和实践例证进行一对一的对比分析与阐释，让学生们进行文本阅读与分析，自己得出判断。同时，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地设计并改进课程模块，与学生们一起讨论与互动，听取他

们的反应，不断地检测教学效果。可见，这本教材

(WCwCC) 实际上就是师生之间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切磋的硕果。

刘：作为主编者，你们认为编写这本教材的优势何在？

B: 我们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个人的知识背景结构与丰富的迁徙和移民经验。我来自美国又长期在欧洲（爱尔兰与瑞士）任教，读书期间接受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人文艺术教育，所涉及的专业领域跨越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除了英美文学与文化外，还包括化学、数学、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法语等。在必要的时候，我还自学了人类学与艺术史。Jerusha 教授也有类似的经历，出身并求学于美国，后来又定居于爱尔兰，在都柏林大学教书 30 多年。她在威利斯大学学习过哲学和艺术史，熟悉美国文学、盎格鲁-爱尔兰文学，对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园林学也有充分的了解。这种广泛而多样的人文背景和专业训练有利于我们把文明所包涵的不同领域关联起来，整全地进行透视。此外，我们经常穿越在中国、美国、爱尔兰（及英法、瑞士等欧洲国家）之间，也曾讲学、旅行于非洲、日本等世界各地。这种跨界和跨语言的学习、工作、旅行与移民经历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具有感性的个体经验，也为我们对比西中文明

的同与异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和观察角度。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研究与我们自身的学习、生活阅历与个体经验密切相关。离开祖国意味着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庭、地域、社交圈和归属感，遭遇一个几乎全新未知的空间。我们生活在自己国家之外的时候，会对异国经验非常敏感，不由自主地把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明进行比较，并抛弃原先既定狭隘的观念以了解和适应新的环境。探索异国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实际上也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和技巧。即便是那些痛苦的或不舒适的经验也可以成为理解他者文化的例证。所以对我们来说，来到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中国，经历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与社会，自身丰富的个人经验就成为我们观察与研究的基点。但我们更希望探索挖掘文化深层中那些潜在的假定与态度究竟从何而来，从而使得个人的观察建立在系统而全备的研究与具体的教学实践上。所有这些，使得我们编写的这本书显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刘：与同类的中西比较文化方面的书相比，你们的这本书有什么独特之处？

B & M: *WCwCC* 是一本基础性的读物，它面对的对象是那些对自己的文明略知一二，同时对其他文明也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本书附有大量的中西对比的参考文献，并提出相关问题让读者思考。同时，它还兼顾了中国和西方读者

两方面的不同需求，为彼此理解对方的文明提供了最基础的比较视角。本教材的宗旨就是为学生提供最基本的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框架，通过核心观念的串联，把两个悠久的文明传统进行一对一的并列对比，从而通过教育，训练自身的比较的双重视角或者阐释范式。我们的目标是理解（understanding），在更好地理解陌生他者的同时也更好地理解自身，理解我们所处的变化中的世界。为了方便使用教材的老师和入门者，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图深入浅出，提纲挈领。

刘燕：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亲自作序，认为他为学生开设的“中西文化比较”与你开设的“中西文明比照”在教材内容的编写和安排上是恰恰形成了互补。是否可以具体谈谈这本书的编写体例？

B & M: WCwCC 不同于一般传统的编写方法或者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即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的编年模式（chronological model），而是根据时下最关注的主题概念进行个案编排（以“Encounters”为对应的模块 modules），比较吻合每个学期的教学时间。除了序言和总结部分，本书包括六个模块的教学内容：1.学习 Learning；2.家庭 Families；3 人性定义（包括身体与自我）Defining Humans (bodies and selves)；4.人与环境

(包括经济与生态) **Human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economics versus ecology); 5.人与权力 (**Humans and Authority**) ; 6.价值与世界观 (**Values and Worldviews**)。每个模块又分为传统 (**traditional**) 与现代 (**modern**) 相对应的两部分。*WCwCC* 摘录了中西文明史上许多重要的经典文献, 进行一对一的比照, 从相对具体的比较到更为抽象的比较, 循序渐进, 这可以为教材的使用老师和学生提供一种有效的学习模式, 兼顾了入门学习以及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 (附录有大量的参考文献可供阅读) 两方面的需求。此外, 本书采用了最适合检索的电书版 (**CD-ROM**), 有助于携带与查阅, 既轻便环保又经济实用, 每本书的售价仅 40 元。

刘: 这既方便了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握中西文明的整体概况、关键术语和基本特征, 又有助于老师有条不紊地操作, 把核心概念与典型案例、研究方法 with 问题思考纳入到宏观的框架体系中进行阐释。那么, 与第一版相比, 第三版的《西中文明比照》(*WCwCC*) 有哪些方面的修改或补充?

B & M: 我们非常关注时下重要的讨论话题。例如环境、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问题, 人类如何面对汶川地震等巨大灾难的问题。因此, *WCwCC* 的现代部分不是根据具体的时间而是根据一些具有冲突性的关键问题 (如在现代社会

中传统如何回应新的挑战)进行编排。读者可以看到后现代视野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是如何挑战传统文化的观念与实践。这一版还增加了一些新近的比较研究的论文范例 (如中国学者辜正坤、资中筠、赵汀阳的文章)。全书 CD-ROM 上载有 1680 页, 主体部分有 622 页, 附录资料近千页, 根据每种文明的历史时期和重要方面, 置列了许多可供选择的阅读文本, 如相关重要资料 (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或道教, 现代西方科学等)。这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索。我们希望这本教材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大学课堂, 也可用于美国、瑞士和爱尔兰等大学, WCwCC 的美国版于 2012 年出版。

刘: 这么多年来, 当你们以外来学者 (outsider-scholar) 的身份来研究中国文明的时候, 你们获得哪些独特而有用的经验和启示?

B & M: 当我们以局外者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与中国心灵的时候, 我们力图不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对异国文化得出“好”与“坏”、“优”与“劣”之类的简答判断或结论。虽然纯粹意义上的客观性无法做到, 但要尽可能地避免主观判断, 减少个人的偏见, 对各种问题的见解或答案持开放的、不断修正的态度。另外, 我们的特殊身份也避免了 we 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或外界干扰。这本教材尽可能让学生们通过阅

读原始文本，得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因此，我们不是中国文化的阐释者，只是承担着提出问题和帮助解决问题的角色。限于个人理解的局限性，限于各种问题的错综复杂，这本教材也必然存在许多的不足（无论是理论构架还是相关资料），无法囊括所有的问题和材料。例如，本书的理论框架所采用的分类法以及对概念的运用依然来自西方，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文化的自身特征，对于“自然”“心灵”之类的概念中西有着不同的内涵与阐释。但局限性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努力毫无意义。在这样一个时刻变化的世界上，所有的理解都是有限的，这有待于我们开放心灵，有待于通过更好更深的理解或更多可靠的材料证据来调整既有的看法，修正存在的局限性。

刘：读完 WCwCC 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你们涉猎的话题之广泛，囊括了教育、家庭、性别、心理、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现代技术、经济、政治、生态、伦理、法律、道德等各个领域，通过梳理各种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各种文本，对人性、幸福、和谐、平等、权利、自由、人权、正义等重要的文明概念进行了一对一的对比，而且提出了许多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却并不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这本教材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后现代式教育范式，其思考之缜密、问题之深刻、见解之敏锐，资料之浩

瀚，图片之生动，这在同类教材中独树一帜，极富个性和创造性。我感觉到你们自身的治学风格和生活理念恰恰体现了中西文明的最佳境界，即“知行合一”。

B & M: 的确，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生活、教学与写作，我们的经历与治学皆体现了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的挑战与调适，这个过程不但丰富了我们的个人世界，也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作为教师，我们一直希望与所有的人一起分享我们的生活体验与研究心得。值得一提的是，对本书做出贡献的人很多，许多中国同事、学者们提出过许多中肯尖锐的意见。在教学过程中，研究生们不断提出问题，参与讨论，付出了辛苦的努力。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每个读者都参与其中，开放自己的心灵，打开自己的视野，提升自身的境界。在全球化时代大家一起构筑跨文化的中西文明的交流与合作之桥，因为每个人都是未来新时代的参与者、探索者与创造者。我希望阅读和使用本书的读者可以给我们写邮件，反馈不同的意见。

刘：谈到具体的中爱文化的合作，我想提及杰鲁莎教授主编的《爱尔兰人与中国》（*China and The Irish*）一书，它被誉为中爱建交三十年的第一本开创性著作。我读到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Mary McAleese）亲自为本书致辞，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先生（Declan Kelleher）撰写

了后记。你可以具体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吗？从你的比较视野来看，爱尔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哪些同异之处？

M：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国镜像中的爱尔兰》写到的：“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和爱尔兰又有着惊人的可比性。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遗产，而其中又不乏动荡的岁月。两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都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或许甚至包括后现代）文化的转变。最后，作为实现富裕时间不长的国家，两国都要面对共同的难题，都在寻找自身关于中国人或者爱尔兰人身份的定义。”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爱尔兰与中国人在性格很相似，都比较含蓄，要拐弯抹角地说话，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直率坦诚。

刘：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中不断在寻求对国家或民族身份的重新理解。你是如何理解当代“爱尔兰人”的身份或当代“中国人”的身份？

M：不久前，许多爱尔兰人不愿将北爱尔兰人视为“爱尔兰人”；但现在北爱纳入到了“大爱尔兰”（Greater Irish Nation）的概念。因此，出身在北爱安特里姆郡，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马葛尔尼伯爵就（Earl Macartney，1737-1806）可以归于“大爱尔兰人”的概念中；19世纪末在中国担任了十多年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也是北爱人，已经被爱尔兰

人视为“我们中之一”。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也促使中国人在不断地寻求关于自身及其文化的新模式。在中国旅行，你会发现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相差甚大，在语言、风俗、饮食等许多方面都各具特色。

刘：你的书有助于我重新了解爱尔兰这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历史。此前我一直把 1793 年率领英国使团首次来华朝见乾隆皇帝的马葛尔尼伯爵视为纯粹的英国人，原来他也属于爱尔兰，其身份是多重的。由此看来，中爱之间的历史交往与关联应当追溯得更早了。

M：的确如此。二十多年前，那些对民族概念持狭隘理解的人并不认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 - 1900）是“我们中之一”，而现在他已经成为我们中引以为傲的一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恰恰是王尔德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爱尔兰身份使之与其哲学导师、中国伟大的先贤庄子心心相通。

刘：你在《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中国哲人》中也提到：“在庄子的作品中，王尔德已经找到了自己革命思想的确证。而且，在庄子的灵魂的伴随下，王尔德开始并永远改变了人类思想的覆辙方向，尤其在美学方面。”这篇文章让我通

过王尔德对庄子（道家哲学）的借鉴与认同，重新理解了这位惊世骇俗、具有反叛思想的重要艺术家；尤其是从中西比较的视角阐释了为什么王尔德会从道德价值转向美学价值，从而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潮。

M：可以说，正是庄子的学说帮助王尔德梳理并提升了自己的革命性思想，认识到个人必须摆脱对社会的顺从。庄子的“无为”主张恰恰是从道德世界进入纯粹审美世界的重要途径。正如庄子的“至人”是从儒家的枷锁中摆脱出来的自由人，王尔德的“浪荡子”（dandy/gentlemen）则是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监狱中解放出来的绅士，成为蔑视尘世中狭隘的道德关切的审美者。

刘：有意思的是，王尔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灵魂》同样受到中国“五四”青年的推崇，其《道林·格雷画像》和《莎乐美》等文学作品也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唯美主义文学思潮。这似乎说明中国的传统思想不仅曾经改变了西方世界，也以另一种方式回流在自身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正如你所提及的：“寻求理解我们与他者（甚至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他者）的关系能够成为认识自我的新途径”。

M：历史上中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地催生活力，激发了彼此的灵感。尽管两国在人口、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相差甚远，但都可以相互起到一面镜子的作用

从新鲜的、甚至是难解的视角来反思本国文化。对于爱尔兰人而言，中国成为一面镜鉴爱尔兰的镜子，反之亦然。我认为中国可以从爱尔兰文化的研究中获益，我们知道斯威夫特、萧伯纳、王尔德、叶芝、乔伊斯、贝克特、西尼等爱尔兰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影响，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2007年3月在北外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综合性、跨学科的“爱尔兰研究中心”(Irish Research Center)。我正在该中心教授“爱尔兰文学”，一直忙碌穿梭于爱尔兰与中国、欧洲与亚洲之间。

刘：中爱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越来越多。我到UCD的英语、戏剧和电影学院(School of English, Drama and Film)做访问学者，就是获得了由爱尔兰教育部提供资助的“中爱互换奖学金项目”。我留学的院系恰巧是你曾经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地方。我们竟然有机缘在都柏林见面，我感觉到中爱两国之间存在着某种神奇的关联。我的一个深刻体会是，到了都柏林才更了解北京，爱尔兰的灵魂使得我越来越认清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特征。通过对异国文化的切身体验、领悟并反观自身的文化，这种跨界的比较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心灵和世界。

B & M：非常高兴我们在都柏林重逢。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有类似的强烈感受与深刻体验。

刘：我了解到你们在 2010 年成立了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West，简称 IACSCW），Blair 教授担任会长，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担任副会长，Jerusha 教授担任行政秘书。这标志着中西比较文化的学者们开始联手合作，一起开展学术交流与活动。你们为什么想到要成立这个协会？目前有什么计划？

B & M: 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中西交流越来越频繁，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在经济贸易、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我们希望提供一个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交流平台，让全世界比较文化的学者、研究者、爱好者与读者都参与其中，一起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通过举办会议、论坛或者出版书籍来推动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与合作。协会网站为 <http://chinaandthewest.org>。感兴趣的研究者与参与者可以在网上注册为会员。我们正在筹备于 2013 年 7 月初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初步拟定的会议主题围绕“中西比较研究”。

刘：以西方人的视角而言，你们是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现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及如何在适应世界潮流的前景中保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所谓的民族文化复兴问题）？

中国学界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一直很热烈尖锐，你可以从比较的角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B & M: 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极具变化的、不可预知的全球化时代，年轻人更要面对不同的文化挑战。他们一方面要理解他者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有自身文化的立足点。而且，通过理解他者文化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遗产。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复兴的趋势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激发出来的。我们认为人类对家庭、幸福、友谊都有共同的需求，都要努力实现其梦想。但如今我们都要面对相同的处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自然与有限的资源，所以生态与经济冲突问题是大家都要面对的，还有教育方面的议题。其实我们的共同性比彼此的差异性更多。基督教的“爱”与儒家传统的“仁”皆体现了一种普世价值。所以东西方应力求相互理解，并肩合作，共同面对我们时代的困境。

刘: 我很感动的一幕是你们在 2004 年喜结良缘，并在北京的白云观举行了“两个洋人的婚礼，祈福道场”。你们怎么想到要中国的传统仪式（而非在教堂）庆贺你们的结合？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对道家传统的某种精神皈依？我想知道的是，中西文明的碰撞、相遇与比较研究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B & M: 我们很欣赏的道家哲学，它提供了一种通向精神生活的独特途径。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异曲同工。一种前现代的古老传统可以在后现代哲学中找到回应。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开拓了我们的心灵世界，令我们在所思所行中受益匪浅。在白云观的婚礼祈福，象征着我们两个人希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此前我们有各自的家庭，也都经历了伴侣逝去的悲痛，而中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新生活的起点。

刘：那么，可以说，《西中文明比照》这本书就是你们的新生儿？

B & M: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刘燕：如果让你们在美国波士顿、爱尔兰都柏林、法国巴黎、瑞士日内瓦或者中国北京这几个城市选择居住，你们更喜欢哪一处？

M: 都柏林的家属于我。法国的家属于他。波士顿是孩子的家，我们经常要回到北京。所以，我俩始终处在连接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文化的飞机上（space-airport）。这种感觉非常神奇美妙。在以上提到的这些地方我们感觉很舒适，但是只有连接不同文明和国家的特殊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居所。

刘：我一直为你们毕生呕心沥血，以不可思议的热情和孜

孜孜不倦的工作搭建中西跨文化之桥的努力所感动。你们年事已高，希望在跨越遥远空间的旅途与行走、工作中多多保重身体，也祝福你们在中国生活愉快、幸福。

B & M: 多谢！希望我们北京再见。

特注：本访谈得到了两位访谈者的过目，并允许发表。